

四川文史資料选輯

第七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 编

目 录

康定解放回忆.....张为炯（1）

建国联军的形成及其演变.....廖仲和（12）

由杨森发动“统一之战”到川黔联军
倒杨战争.....傅渊希（32）

刘湘、杨森联合驱袁祖铭经过
.....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51）

四川省银行内幕一瞥.....何兆青（68）

企图走资本主义合作社道路的宝元通
公司.....萧则可 黄凉尘（101）

从成都市自来水公司看反动统治下的
社会福利事业.....李铁夫 米庆云（116）

西南民间运输巨擘“麻乡约”
.....四川省志交通志编辑组（127）

自流井王三畏堂兴亡纪要(待续)
.....罗筱元(159)

一九一九年川东烟案见闻记
.....廖仲和(173)

经营“特业”五年纪略.....曾俊臣(182)

一九四一年重庆防空大隧道窒息惨案
回忆.....丁荣灿(200)

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亲历.....谢藻生(210)

二刘之战战前各军驻地表.....吴光骏(213)

质疑、补充、订正

对有关刘、田成都巷战各文的几点
补正.....何煌荣(222)

对护国之役丰都战斗一文的补充和
商榷.....石大城(226)

军阀罗泽洲被部下驱逐实况
.....傅渊希(230)

康定解放回忆

张 为 炯

一、西康起义前后的概括情况

西康原属四川省一部份辖地，自1939年改制为西康省后，即由刘文辉任省主席。西康共38个县局，大体分为三个辖区，即雅属（以雅安为中心的各县，与川西接壤），宁属（以西昌为中心的各县，与云南接壤）、康属（以康定为中心的各县，与西藏接壤）。省会设在康定，但刘本人以驻雅安和成都的时间较多。

1948年冬，解放战争在东北节节胜利，四平街被解放的消息传到康定后，前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即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座的有：民政厅厅长代行省主席张为炯、保安副司令王靖宇、二十四军康定行营主任唐英、财政厅会办李先春、省府秘书长陶世杰、省府顾问代理保安副司令朱钰等。刘文辉认为：“蒋介石所作所为不得人心，调往东北的主力已被击溃，解放军又善于作战，蒋介石说不定要垮台。但重庆有行营，西昌有行辕，他对西南几省决不会轻易放手。川康两省会形成最后挣扎的战场。我留在康定作用不大，为了因应西南局势的变化和保障西康集体安全，我必须到成都主持运用。我离开后，西康全境要力求安定，康属方面由张为炯主

持负责；雅属方面王靖宇、陈仲光（田粮处处长）负责，宁属方面由伍培英负责，希望大家镇静处之，以观时变。”刘文辉从此去成都后就一直未回康定。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在四川彭县与邓锡侯、潘文华等领衔宣布川康两省起义。10日晚上我们收到电报后，康定同时响应迎接解放。时，西昌方面为伪西昌行辕（伪行辕主任贺国光）所控制。驻军伍培英师长刚宣布起义，即遭伪西昌行辕袭击以致失败。直到1950年4月解放军进入西昌后，宁属方面才得到全部解放。雅安于1949年12月10日宣布起义后，先由西康保安副司令王靖宇负责维持地方秩序。1950年2月1日由廖志高政委、刘忠司令员率领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之一部到达雅安。适雅安、荣经土匪麇集，围攻县城，伪保安副司令王靖宇部队与土匪互相勾结，里应外合公然叛变，结果被解放军勒令缴械，并将土匪击溃，雅城乃转危为安。随即分别从康定、西昌进军，平定叛乱，全康乃得解放。康定方面也经过伪中央军田中田部的窜扰和伪二十四军康定行营主任唐英的叛变事故。我当时是以代省主席的身份留在康定。现在，就我在康定方面所经历的情况概述如次。

二、我在康定解放前后的亲身经历

刘文辉在彭县的起义通电，康定是12月10日晚才收到的。我当时约集康定的各方负责人士商议，决定立即响应，并采取了以下几种紧急措施：

1. 决定通知省会各机关团负责人于12月12日齐集省府大礼堂，响应刘文辉主席通电，宣布全省起义迎接解放，与蒋介石反动政权断绝关系。2. 康定宣布戒严，由警卫团团长

兼城防司令王玉岗负责维持省会治安。立即将反动政权的特务分子扣捕，没收其电台和武器。3.命令伪中央各机关职工人员照常供职，不得擅离职守和隐匿盗窃公家财产。4.通令各厅处及关外各专县照常供职，准备交代以待解放军之到来。

当宣布起义时，到场各界人士无不表示热烈欢迎。街上普遍张贴“欢迎解放军”“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万岁”等标语。但不数日，即风闻有胡宗南部队取道乐西公路窜入西康的消息。省府立即电令汉源县县长杜国桢和二十四军团长张纯嘏严密防守乐西公路并破坏险隘地段蓑衣岭等处，以阻止国民党军队窜往西昌，并电令富林前宁属屯垦总司令羊涌全发动当地团队协力防守。终因公路未尽破坏，驻军、团队防守不力，胡宗南的王伯华师和胡长青所部以越西田坝土司岭光电作响导，终于窜入富林。同时二十四军师长伍培英在西昌起义失败退守富林，闻黄木厂不守，即退驻汉源城。西康省府同二十四军康定行营乃会委二十四军团长兼巴安保安司令傅德铨为康属警备司令，率所部四个连（其余部队分驻关外康南北）进驻泸定县，并指挥省府警卫团肖谦营和保安第二团陈甘霖营（由冕宁退到泸定）以及康定、泸定、天全、汉源各县地方团队，东面扼守飞越岭，派陈、肖两营驰赴汉源协助张纯嘏团抵御胡宗南部队，北面扼守二郎山，协助驻天全的二十四军黄以仁团和保安队罗克明、黄煜两营肃清天全、芦山、荣经一带的程志武、李元亨等土匪。省府警卫团阙惠农团附率肖谦营驰赴汉源防守时，与张纯嘏团在汉源场小关子一带同王伯华匪部相持数十日。匪势猖獗，张团放弃汉源城退守大相岭，阙惠农、肖谦则退守泥头，傅德铨

率新兵一营驻扎泸定遥为声援。这时候，解放军虽派有一营兵进入天全，但以康雅、成雅道上土匪阻塞，粮食未充分准备，急切开不到康定。适伪中央军田中田匪队约二千人由懋功西竄，西康省府接到丹巴县长张植初急电称，伪中央军武器精良，作战力强，已由马尔康到达靖化，正向丹巴境内前进；继又电称，伪中央军田中田师长有信给他，说明将取道丹巴、康定、泸定与胡宗南会师于汉源，请勿阻拦等语。我当即同唐英、傅德铨、陶世杰、宋钰商量，一面电令张植初督率地方团队择要扼守，勿使匪军窜入康境，一面令傅德铨抽调泸定部队驰往大炮山扼守，拒阻匪军。同时电请雅安廖志高主席（此时廖已发表为西康省主席）、刘忠司令员迅速派队星夜驰援。嗣得雅安复电，现正清剿雅安、天全一带土匪，半个月內不能分兵来援，嘱策动地方武力固守康定。继得张植初迭电称，匪军势大，正向丹巴前进，众寡不敌，无力防守，已由丹巴向乾宁道上撤退（后来张植初在丹乾途中被土匪击毙）。此时由泸定调回傅德铨团，只到了两连，由康属警备副司令龚耕耘率往大炮山防堵；警卫团只有兵三连，已派两连前往距康定四十里的中古为第二道防线。驻康定城防部队只有唐英的护卫连一连和警卫团的少数士兵。张植初放弃丹巴后，龚耕耘于3月3日来电称，田中田部队已突破大炮山第一道防线，我军不支已向后撤退。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康定的局面是相当严重的：第一，是二十四军和王玉岗警卫团在康定的纪律不甚好，老百姓对之不是拥护而是不满；对共产党，因平日受到反动派宣传煽惑，心怀畏惧；第二，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暗中活动，惟恐解放军早日到来，因而希望田中田匪部进驻康定，别开生面；第三，是某

些将领平时贪污腐化，恐怕不见容于新社会，对革命无丝毫信念，因此情绪低落，心怀异志。有此种种种原因，我感到自己势孤力微，康定局面很难维系，乃决心出走，再图善后。当于4日召集有关高级人员和地方人士说明自己意见。我既响应刘文辉主席起义，就有自己的立场。我如留在康定，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与田中田“合作”，跟着他走；一条是作田中田的阶下囚，任其宰割。这两条路我都不愿意走。唯一的路只有暂时出走。不过，我在康定住了十一年，地方上没有出过乱子，若因我走而发生事故，那就对不住西康人民，希望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本地人士出面维持临时秩序，以免糜烂地方，则为万幸。至于省府各厅处负责人员或留或走自作准备。由于经费无着，我也不能要求大家非走不可。当时到会的人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无结果而散。

这些时候，由于解放军在雅属清剿土匪，一时开不到康定。蒋匪特务遂乘机造谣，四处煽动，有些地方不免出现浮动不安之象。我为了安定民心，乃分别派员向各地土司、头人和喇嘛寺庙宣传解放军宗旨，劝他们响应刘文辉主席起义号召，不要听信谣言，以消除蒋匪特务散布的反动毒素。同时密令木呷乡区长胡绍基召集地方骑队在扎多山、营官寨附近暗中警戒，以防不虞。后来都收到一定的效果。

1950年3月5日下午，田匪先遣侦探已到北关附近，我始离开康定出走营官寨，计同行者有李先春、陶世杰、宋钰、王玉岗、杨致中（警保处处长）、万坤培（省卫生处处长）、李次良（省府电台台长，带有电台一部）、铁德良（译电员）等。警卫团杨品勋营亦于同日出发。出走前，并指示傅德铨，必要时把部队撤出城外，但不宜距城太远，须

于附近择要扼守，严密监视敌人。是夜，我宿营扎多塘，次日翻过扎多山，到达水桥子，才由电机与雅安军管会取得联系，向廖主席汇报出走经过。廖主席指示，到营官寨后每天与雅安电台通信一次，以便互通情报。第四天到了营官寨，便把出走经过电告成都刘文辉。到营官寨的次日，唐英、傅德铨也率其所部到营官寨后方的新都桥驻扎，为以后正式叛变作好了准备。

三、蒋匪帮残余势力在西康的最后挣扎和复灭

田中田匪部是在1950年3月5日傍晚进入康定的，当时仅率领任、张两团共五百余人，嗣后又到杨森残部陶团和在丹巴、康定一带临时收编的特务土匪，共计不到两千人。我在营官寨住了将近一个月光景，田中田曾三次派人出关请我回康定合作，伪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两次电请我回康定坐镇，并委我为“康属宣抚使”，都被我拒绝了。田中田最后派龚耕耘到营官寨以交出电台、改编警卫团相威胁，受到我严厉斥责。田中田曾扬言要与西昌行辕派兵会剿。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见着刘文辉和我等的起义通电，已对刘文辉主席及我等给以“撤职查办”处分，对全体省委免职，另委贺国光为西康省主席。康定被田匪占据后，贺国光即委杨仲华（伪中央立法院委员）、戚彬如（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书记长）、高上佑（西康省参议会副议长代理议长）、张坦如（伪西康省政府教育厅长）、格桑悦希（伪中央监察院委员）为西康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杨仲华为主任委员组织康定政务委员会（高上佑于康定起义后同西康建设厅长王孟周，潜赴西昌转逃台湾，格桑悦希于田匪进入康定的早晨即赴康南）。杨

仲华即于原省府宣布就职，接收各机关，并由伪西昌行辕空投黄金及弹药等予以支援，田中田则极尽搜刮残杀之能事。殊不知，不到旬日，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放了泸定，占领了泸定桥。田匪在泸定的一部早向冕宁溃逃。田匪本人则率队由九龙向西昌方面逃窜，结果在川、滇边境逃不出天罗地网，受到二野解放军的截击，全部消灭。杨仲华、张坦如等反革命分子在康定先后被捕伏法，戚彬如在九龙与云南边境被解放军擒获法办。康定人民从此重见了天日。康定于3月24日获得解放后，即成立了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苗逢澍政委和樊执中司令员即派解参谋率便衣队到营官寨，把我和一行人员接回康定。承党的信任给我以西康省副主席的职务，俾我有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既感激又很惭愧。我在康定一面办理省府交代，一面商承康定军管会指示，先后把二十四军戍边部队调离康境到成都附近整编，才赴雅安供职。

田匪在康定不过二十天，但所作的坏事却不少。在城内外大肆搜抢，除将刘文辉、李先春和我的住宅尽量搜索囊括而外，并派特务四出侦查，对进步人士和形迹可疑者辄加暗害。如民盟成员朱刚甫在田匪退走前夕，即被杀害于警察局，其尸体被狗拖出始为人所发觉。还有小学教员和其它十余人被其绑架胁迫走，至川、滇边境遇解放军才被救出。泸定县长张永春被胁迫走后生死不明。最令人痛心的是旧省府青年职员李御良、陈宗严，在田匪快到康定前由成都到康定搞地下工作，以旧部属的身份来见我，我即告以田匪快到康定，我决定出走营官寨，你们能去则同去，不能去可暂时离此以免危险。后来他俩到泸定地面被田匪部队捕获，在磨西面光荣牺牲，

临刑时神色自若，高呼共产党万岁，见者闻者莫不感动。

四、唐英、傅德铨的叛变

唐英、傅德铨在康定响应刘文辉起义之初，表面上尚看不出有什么异动。当雅安保安司令王靖宇部队叛变被解放军缴枪，王靖宇被扣押后，廖主席曾有电给我，说明事变的经过，叫康属部队不要误会。我曾把电报给唐英看过。他虽没有表示，但对王靖宇的被扣，不会无动于衷。那时各地匪徒四起，谣言甚众，特务们并大肆宣传刘文辉等在成都已被解放军软禁。有人认为刘文辉起义走错了路。同时，富林的羊清全（刘文辉的旧部）与胡宗南匪部已联合一起，接受了贺国光委任的某司令伪职。李元亨（土匪）已到达金汤，声称要进攻康定。盘据汉源的胡长普、王伯华匪首又派人潜赴康定进行分化活动。国民党二路游剿总唐式遵也有函给唐英，叫他“反正”。而戚彬如、张坦如、杨仲华、王孟周、龚耕耘等则日夜包围，危言耸听。唐、傅两人平时生活本已极度腐烂，兼之傅德铨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过康区时，曾在巴安与红军打过仗，还受过蒋匪帮的奖励，对共产党恐惧更深。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和反动历史，所以最后终于阴谋叛变，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当田匪窜入丹巴时，傅、龚表面上是派人侦察，实际上是与田匪通款曲。龚耕耘到大炮山，借名指挥部署，实际是欢迎田匪，协商条件。傅德铨退出康定时，留龚耕耘和团部政治主任苏某及部队一连驻在唐英公馆，待田匪入踞康定之后，龚耕耘便代表唐英签字发出了叛变通电。这说明他们事先早已勾结成熟。而唐式遵即据以向伪西昌行辕报功，说什么唐英的反正是由于他的策动。伪西

昌行轅竟大办其祝捷会，并电请蒋介石予以嘉奖。

当时我在营官寨，鉴于唐、傅安心叛变后情势日趋险恶，而警卫团王玉岗部队受傅德铨煽动，四处骚扰，王又无法约束。王本人也心怀叵测，对我也有不利的打算，乃密嘱胡绍基调集民兵数百，暗中戒备，以防万一。康定快到解放的前夕，傅德铨曾一度去康定与田匪晤面，收受了田匪黄金十两，并同意龚耕耘去沙湾附近抗击解放军。又曾密电唐英说，省府随时与雅安通消息，危害我们的行动，请唐英勿顾小情面，采取断然处置，没收省府电台改编省府警卫团。幸解放军进军神速，得以化险为夷，如解放军迟到旬日，难免不发生意外。另一方面，自刘文辉主持康政以来，以尊崇佛教关系，与康南北僧俗民众尚称融洽。我同省府一部分人员退到营官寨后，纷纷前来慰问，表示愿尽保护之责。这也使唐、傅诸人有所顾忌，不敢骤下毒手向我发生事端。

唐、傅叛变后，廖主席迭电我转告他们要立功赎罪，争取田中田放下武器。田匪溃逃时，廖主席又电嘱派队截击，但他们诡词应付，迄无悔罪立功诚意。当我在营官寨要回康定之前，虑及傅德铨驻防康属十余年，与康南北土司、头人多有结纳，又掌握了三个营，分驻巴安、甘孜一带，此时田匪正向康南流窜，万一傅德铨挺而走险，与之勾结一气，难免不貽祸地方，曾电请廖主席从宽处理，也得了允许，并指示唐、傅同我一道回康定；如唐、傅尚有顾虑，缓日回康亦可。党的宽大为怀的精神，于此可以概见。但唐、傅执迷不悟，竟率部向雅江方向逃窜。我回康定后，向军管会说明情由，乃派傅团中校团附龙绍轩兼程驰赴力阻，并晓以利害。唐、傅看到走投无路，乃率队回康听候整编。结果两人都受

到人民的惩罚，先后在劳动改造中病死。

此外，我认识到解放军真是人民的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不给人民带来任何困难。我只举废除“乌拉”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康定解放后，“苛政猛于虎”的“乌拉”制度也随之彻底废除。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从前边地支应差徭，悉由家有牛马的差民应役。自赵尔丰经营川边实行“改土归流”后，遂制定“乌拉”章程，明令给以脚费，较之当地民价相差不远，故差民尚乐于从事。照例军政人员出差支用“乌拉”，商界运输来往，则实行雇用。此为康定到关外的唯一交通工具。后来军政人员乱支“乌拉”，百弊丛生，强迫过站，短给脚费，牛马倒毙不负赔偿责任，差民不胜其苦。往年中古村有一差户困于“乌拉”，愿将全部田产让人耕种收获，但以代替支差为条件，终于无人承担。主持边政者，稍有良心的人，也未尝不想废除“乌拉”制度。西康建省委员会时期，曾试办过“牧站联运”，籍以解纾差民的痛苦，补救交通的困难，终以办不通而终止。康定解放不久，十八军进军西藏，先头部队到达康定，王其梅付政委访问我时，谈及康藏情况，我曾告以储备足够的粮食，解决交通工具为先决条件，否则无法行动。我知道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虽曾建筑一段康青公路，但仅试车时千方百计地通行过一辆汽车，以后就再没有第二辆汽车在这条路上走过。关外交通的困难，一般人都认为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不料十八军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居然没有向人民支用一头“乌拉”，不动声色地向西藏进军去了。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真正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而由来已久无法解决的“乌拉”弊政，随着康定的解放而一去不复返了。不

得不使我欢呼党中央、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将永恒地照耀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角落而与世长存。同时，也使我认识到我们的国家不愧为伟大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军队，我们的党不愧为伟大的党！

建国联军的形成及其演变

廖 仲 和

建国联军，是在1924年由于西南川、滇、黔三省军政当局面临北洋军阀反动势力的扩张和威胁，为了团结力量，加强战斗，互相协议而组成的。联军自形成以至消亡，历时一年多，牵涉面颇广，足资纪录的事实较多，当时我在联军前敌总部参与戎幕，仅就个人见闻所及，扼要记述，以供参考。

（一）建国联军的缘起和组织的概况

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兴师讨伐，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率所部与直系军阀动员入川的直、鲁、豫、鄂等省部队作了不断地激烈战斗，依附于曹锟、吴佩孚的旧川军刘湘、杨森等部亦起而与熊为敌。同时，吴佩孚支持黔省军阀袁祖铭回了贵州，滇军主帅唐继尧则派其弟唐继虞扶助刘显世回贵阳，又将袁祖铭赶走，袁部退至铜仁，复为刘湘、杨森勾结入川共同与熊部作战，使四川战局更加扩大。

1920年川滇黔战役以来，唐继尧与熊克武之间的关系本不融洽，但在曹锟、吴佩孚派北洋军入川及扶持川军刘湘、杨森和黔军袁祖铭时，使他们都感到威胁，在利害关系上不能不力主团结，互相支援。当讨贼军进攻重庆时，熊所属讨贼军新编第一军军长石青阳向熊建议，请唐继尧出兵援川，熊顾

虑唐前怨未释，决定先由石派王干青、阎崇阶到贵阳试探唐继虞、刘显世的态度（时唐任贵州总司令，刘任贵州省长），得到唐、刘同意后，熊才电唐继尧派王、阎为代表进行商谈，结果由唐电令驻贵州的滇军胡若愚军入川，这是唐、熊关系的开始好转。

在滇军胡若愚部协同讨贼军攻占重庆，刘湘、杨森、袁祖铭等部向万县败退时，因讨贼军内部的一些情况，如旧川军第三军刘成勋部虽已加入讨贼军行列，而未积极参战，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兼讨贼军前敌总指挥赖心辉所部又企图保存实力，讨贼军的中心力量新川军第一军但懋辛部及新编第一军石青阳部因久战之后，亟待补充，时但懋辛又已辞职，所部暂由赖心辉指挥，以致对刘、杨、袁各部未予穷追，使其得以整顿，经吴佩孚补充械弹后，又采取主动，进行反攻，讨贼军在垫江、长寿间战败，重庆得而复失。胡若愚率部返回贵州，途中被地方团队及土匪袭击，损失极重而被撤职，由张汝骥代领其众驻防遵义。1924年熊克武率讨贼军由江津、合江、泸州等地退出川境，经赤水到达黔北遵义，唐继虞、刘显世正虑袁祖铭在川得势，回军贵州，甚愿熊部久屯遵义，为之捍卫北门。

讨贼军退出川境后，由于局势的演变，愈显得川、滇、黔三省有进一步团结合作的必要。在白赤水到土城时，石青阳、孔庚、但懋辛等向熊克武提出加强三省合作的意见，熊感到讨贼军撤离川境，孤立无援，而唐继尧以往能派胡若愚军援川，又有愿同川军合作的事实表现，因而同意他们的主张。到遵义时，遂派石、孔、但三人赴贵阳与唐继虞、刘显世洽商，很得唐、刘的支持，电商唐继尧，唐也表示赞同，他们

在贵阳进一步商拟川、滇、黔联军协约草案。当时熊部称“讨贼军”，滇黔两军则称“靖国联军”，既然三省合组联军，必须有统一名称，经他们反复协商，决定采用“建国联军”名义，并拟就协约草案，分电唐继尧、熊克武核定，先由熊克武代表四川，刘显世代表贵州签字后，再由石、孔、但带到昆明，由唐继尧签字，唐以石、但系全权代表也应签名，因而协约经唐继尧、熊克武、刘显世、石青阳、但懋辛五人签字生效。

建国联军协约的内容是：

1. 为削平祸乱，建设国家起见，组织建国联军；
2. 建国联军先由川、滇、黔三省共同组织，其他省友军与联军处同一地位、抱同一宗目的，依联军之许可得加入联军；
3. 建国联军公推总司令一人、副总司令各省一人、前敌总司令一人，并由总、副司令会委各路指挥若干人；
4. 联军系指列入动员计划，参加战斗者而言，其余各省内地留守之兵，不在此范围以内，在必要时须列入联军，应由总、副司令认可，会同委任。
5. 川、滇、黔三省联军一切军费饷需及器械弹药的补充接济，在川局未定以前，暂由滇、黔两省负责筹措，川局定后，械弹的制造由川省负责，至联军所需款项，川省负担三分之二，滇、黔两省共负担三分之一，其款由三省的政府按月交由联军军费统筹处使用；
6. 联军任务，只以军事为限，其各省民政，概由各省地方官民自行处理，联军概不干涉；
7. 凡须各省会同办理事业，如交通经济等类，得由总、